

学科、知识与近代中国研究书系

「世界知识」 创造近代中国的

世界，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其实不大
一旦有心，探其究竟，撼动挑拨，无可预料
阐释“世界知识”被创造生产的历史
也是回答中国与世界关系这道命题的方式

潘光哲 / 著

学科、知识与近代中国研究书系

潘光哲——著

创造近代中国的
「世界知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创造近代中国的“世界知识” / 潘光哲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7

(学科、知识与近代中国研究书系)

ISBN 978 - 7 - 5201 - 4942 - 6

I. ①创… II. ①潘… III. ①思想史 - 研究 - 中国 -
近代 IV. ①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02154 号

· 学科、知识与近代中国研究书系 · 创造近代中国的“世界知识”

著 者 / 潘光哲

出 版 人 / 谢寿光

责任编辑 / 李丽丽 陈肖寒

文稿编辑 / 陈肖寒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历史学分社 (010) 593672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21.25 字 数：293 千字

版 次 / 2019 年 7 月第 1 版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4942 - 6

定 价 / 9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 - 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潘光哲 台湾大学历史系博士。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兼任胡适纪念馆主任。专业研究领域为晚清史、中国现代史、当代台湾史。著有《华盛顿在中国：制作“国父”》（2006）、《“天方夜谭”中研院：现代学术社群史话》（2008）、《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一八三三～一八九八）》（2014）。主编《殷海光全集》（2009）、《容忍与自由：胡适思想精选》（2009）、《傅正〈自由中国〉时期日记选编》（2011）、《胡适全集》（2019）等。

丛书书目

- 重审中国的“近代”：在思想与社会之间 孙江/著
- 会通中西：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基调及其变奏 章清/著
- 一名之立 旬月踟蹰：严复译词研究 沈国威/著
- 东往东来：近代中日之间的语词概念 陈力卫/著
- 创造近代中国的“世界知识” 潘光哲/著
- 真实与建构：中国近代史及科技史新探 [德] 阿梅龙(Iwo Amelung) /著



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CENTER FOR COMPARATIVE STUDIES OF MODERNIZATION, FUDAN UNIVERSITY

本书为以下诸项补助案的部分研究成果，谨此特致谢悃！

1. “国科会”（“科技部”）专题研究计划“‘知识仓库’、‘思想资源’与‘概念变迁’：晚清士人的阅读世界”（计划编号：NSC91 - 2411 - H - 001 - 085、NSC92 - 2411 - H - 001 - 073）。
2. 中研院主题研究计划“近代中国知识转型与知识传播，1600 ~ 1949”之分支计划“近代东亚‘地理想象’的生产、流通与嬗变：以‘世界史地’与‘国际法’知识为中心”（计划年度：2011 ~ 2013/计划代码：AS - 100 - TP - C02 - 4）。
3. “国科会”（“科技部”）专题研究计划“宫崎滔天的革命理念：世界脉络的考察”（计划编号：NSC - 101 - 2410 - H - 001 - 073 - MY2）。
4. 中研院主题研究计划“近代中日关系的多重面向（1850 ~ 1949）”之分支计划“近代中日媒体场域之互动”（计划年度：2013 ~ 2015/计划代码：AS - 102 - TP - C03）。

编辑说明

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成立于 2000 年，是涵盖文、史、政、经等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机构。2004 年，获批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心成立后，致力于推动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尤其重视结合近代学科知识的成长，重新认识近代中国的历史。为此先后组织了基地重大项目“‘普世性’与‘各别性’：现代化进程中文化结构的转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外文化交流与近代中国的知识转型”等。因此机缘，中心也与多家研究机构开展了富于成效的合作，邀请到具有不同背景的学者参加课题的研究。同时，中心研究人员也受邀参与到多家机构所组织的课题中。主要包括德国埃尔兰根 - 纽伦堡大学朗宓榭（Michael Lacker）教授主持的项目“中西学术交流：历史与哲学的维度”、日本关西大学承担的文部省 COE 项目“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基地”，以及张寿安教授主持的中研院主题研究计划“近代中国知识转型与知识传播，1600 ~ 1949”等。

“学科、知识与近代中国研究书系”的出版，正是上述合作研究的产物。汇集的研究成果包括：沈国威《一名之立 旬月踟蹰——严复译词研究》、陈力卫《东往东来——近代中日之间的语词概念》、阿梅龙《真实与建构——中国近代史及科技史新探》、孙江《重审中国的“近代”》、潘光哲《创造近代中国的“世界知识”》、章清《会

通中西——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基调及其变奏》。各位学者有不同的专业背景，皆关注到近代学科知识成长的一些面向，展示出各具特色的研究。

近代学科知识的成长之所以值得关注，乃是因为此与近代世界的诞生密切相关，或者说是同步成长的。包括物理学、社会学、哲学等一系列今日统称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的近代学科知识，之所以奠定了近代世界的基础，在于其提供了有关现实世界新的解释，还支撑起对于社会理念的合法性论证。换言之，对于“现代性”(modernity)的认知，理解也好，质疑也罢，或都有必要结合各分科知识进行检讨。对此的关注曾构成马克斯·韦伯学说的核心——以“世界的祛魅”作为问题的肇端。哈贝马斯则勾画出不同时期社会理念合法性论证的不同基础，指明自现代科学产生以来所产生的影响。查尔斯·泰勒还具体阐明“西方现代性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具有魔法力量和神灵的世界的消失”。凡此，皆道出现代社会的建立可视作“理性化”的过程，而以“科学”为标志的各分科知识，对于理解近代世界的诞生、理解“现代性”的成长，具有重大意义。

学科知识的“援西入中”，对于理解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自有其重要性。最基本的，中国社会有关现实世界及社会理念合法性论证的基础，也渐次脱离传统的“学术资源”，转而采纳近代学科知识所提供的“知识资源”。而且，这一过程不仅决定了中国当代学术的理论和实践，从20世纪初开始，更通过以分科知识为“专史”的书写样式，重新塑造了“中国之过去”。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所有重要问题的展开，都受到自16世纪至20世纪之间所接受的分科知识及学科术语的影响。1923年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即是其中之显例。或许可以说，近代学科知识在中国的成长，是值得进一步发掘的课题。

当然，必须看到的是，近代学科知识的成长是涉及全球范围的文化迁移现象，相应的，各个国家在“知识转型”与“知识传播”上

也有着自身的成长脉络。传统因素的重要作用，也意味着并不存在“单一的进程”，所呈现的是“多种多样的现代性”。不仅历史进程经常会发生偏离，其过程也尚未“终结”。故此，基于中国背景检讨近代学科知识的形成，也需要考虑两类相互联系的问题。其一是西方以分科为标志的近代知识是如何传入的，需分析与西学传入相关的论作（包括译作及独立文本），各学科专门术语的翻译和标准术语词汇的出现，以及新术语在中国思想新的发展阶段的应用。其二是中国本土接纳分科知识的制度和社会背景，当重点检讨各层次教育中新课程的输入和介绍、相关研究机构的建立和发展、公众对新学科的反响及对这段历史的重构。

“学科、知识与近代中国研究书系”旨在基于近代学科知识成长的视野审视近代中国的历史，并把这一过程视为近代中国接受西学的一个特殊结果来分析；旨在促进对近代学科知识形成的复杂过程的理解，同时致力于解决与此相关的方法论和概念上的难题。各书针对近代学科知识的研究，尽管已涉及不同层面，但显然还不足以涵盖此一课题所涉及的广泛领域。接下来中心还将致力于“东西知识环流与近代中国”课题的研究，希望能继续推进相关研究成果的出版。

上述各位学者作为中心的专职或兼职研究人员，对于推进中心课题的研究，倾力颇多；能将他们这些年完成的研究成果列入学科、知识与近代中国研究书系出版，更是对中心工作莫大的支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首席编辑徐思彦、近代史编辑室主任宋荣欣及其所领导的编辑团队，对于书系的出版尽心尽责，在此也要表达真挚的感谢。

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自序

或许因为父亲在眷村里是邻长的关系，家里总有免费的《中央日报》可看。在1970年代的台湾，《中央日报》当然不会出现忤逆党国意识形态框框的言论；想要看“刺激”一点的政论，只能看别家报纸。可是，我还是舍不得不看《中央日报》，因为它每周四（还是周五？）固定出刊的《地图周刊》，寓时事报道与评论于地图之中，“立体化”地展现了国际现实局势的变迁。还只是小学生的我，即便搞不清楚究竟乌拉圭与巴拉圭有什么差别，却早就从《地图周刊》知道，它们绝对是两个不同的国家。

回想起这段人生故事，感喟万千。即使在文网严密的时代里，有心之士还是愿意竭尽其能，要让读者知道天下之广，沧海之奇，眼光千万别被天然的地理环境给限制住，绝对应该放眼世界，洞悉世局。他们打开的窗口，正是这部小书的主题：我们的前行者，究竟如何试图突破既存的知识囚牢，眼观寰宇，为追觅“世界知识”奋力以行？史学工作者与青史故迹的对话，不是不能和自己的生命经验结合在一起的。

当然，史学工作者的观照所及，可能引发的感触回响，绝对无从预料；倘能严谨而为，创生的成果，多少能对厚积人类的学术/知识板块，供应些许原料。本书所录文稿，固为旧年积存，个人仍愿尽力整合，增补删汰。惟限于时日，知闻不广，力不从心，谬误仍多，敬

望史林博雅同仁，多所批判教正。

本书的出版，是章清教授积极鼓动的结果；各篇文稿之撰写，屡蒙史学前輩張灝、狭間直樹、陳永發、王汎森、羅志田、桑兵、黃自進、黃克武、王宏志、村田雄二郎、沙培德（Peter Zarrow）等教授的指教；共步史林論學辯難的薛化元、劉季倫、林富士、陳力衛、孫江、水羽信男、石川禎浩、川尻文彥與箱田惠子等教授，開我智竊，惠賜史料，恩誼所在，尤須感念。全書定稿工作，完成于日本京都的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特別感謝劉建輝教授的帮助。定稿工作期間，突聞摯友孫善豪教授英年早去，壯志未酬之噩耗，戚悲無已。在個人知識成長的歲月里，得到善豪教授的多重助力，銘感至極。敬以本書紀念這位永遠不老的青年。

目 录

CONTENTS

自 序 / i

导 论 / 001

第一章 近代东亚报刊与“世界知识”的互动空间 / 018

第二章 开创“世界知识”的公共空间：《时务报》译稿研究 / 039

第三章 西方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在晚清中国的创发
与建设（1845～1895） / 095

第四章 创造“革命想象”的知识文本：以章士钊
“译录”的《孙逸仙》为中心 / 191

第五章 “世界史地”与“国际法”知识和近代东亚“地理想象”的
生产、流通与嬗变：回顾与思考 / 222

第六章 中国近代“转型时代”的“地理想象”
(1895～1925) / 243

参考文献 / 283

索 引 / 322

导 论

俄罗斯的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 1672 – 1725），一代豪雄，影响深远。他的形象，在俄罗斯历史长河里的转易，本来就不仅是其政治、社会价值变迁之写照，也为思索其国族意识（national consciousness）的本质，提供一面镜子。^① 他的声名，远播寰宇，特别是他为推动俄罗斯帝国的扩张，借鉴“他山之石”，竟尔一己亲身微服出访，游历西欧的轶事，脍炙人口，也喧腾于异乡他邦；对他的形象认知，在俄罗斯大地之外激发的回应想象，曾无已时。像彼得大帝的访英之行（1698年1月11日至4月21日），就开启英国人对他（与沙皇）形象认识之契机，甚至戏剧舞台上都出现他的影像，在人们喜闻乐见的娱乐天地里占有一席之地。^②

时易境转，彼得大帝的“魅力”，未尝稍减。百余年后，东亚世界里的卓异之士，一旦知晓他的行止作为，竟也驰骋思维，即便各有

^① Nicholas V. Riasanovsky, *The Image of Peter the Great in Russian History and Thought*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② 参见 Anthony Cross, *Peter the Great through British Eyes: Perceptions an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Tsar since 1698* (Cambridge &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侧重，意欲取为楷模的心怀，则是同向如一。即如在近代日本和中国历史舞台上都必然不会被遗忘的佐久间象山和康有为，时间相去四十余年（佐久间于1864年在京都三条木屋町被暗杀的时候，康有为才是六岁的孩童），双方却都引征彼得大帝，作为自己国族构思图存求强方案的例证。在佐久间象山知晓清朝兵败于鸦片战争的讯息之后，于1842年上书给担任德川幕府老中一职的真田幸贯，在这封俗称为《海防八策》的上书里，^①他说俄罗斯的彼得大帝，鉴于其国缺乏“大船”，海军欠缺训练，航海之技早已荒疏，因此亲身前往荷兰学习诸艺，借以督责劝奖俄国人开始讲求，正是有赖此等“豪杰之主”，竟使俄罗斯从“顽愚之贫国”的地位，转而成为可与西洋他国相提并立的国家。^②相较于佐久间象山，康有为上书的对象，可是九五之尊的清德宗（俗称光绪帝）。康有为在所谓“公车上书”的行动里，^③向光绪皇帝提出的建言（1895年5月2日），就已经声言“俄主彼得乃至易作工人，躬习其业，归而变政，故能骤强”。^④他的这份建言，当时没有得到光绪帝“御览”的可能性；^⑤等到他有机会让自己的意见“上达天听”之后，彼得大帝的行止，则成为康有为鼓动光绪帝“亟筹自强”的楷模，他特别“译纂”了《俄彼得变政

^① 源了圓「佐久間象山」『歴史人物シリーズ—幕末・維新の群像』PHP研究所、1990、87～101頁；大平喜間多「佐久間象山」『人物叢書』吉川弘文館、1987（新装版）、62～68頁。

^② 信夫清三郎『象山と松陰—開國と攘夷の論理』河出書房新社、1975、99頁。当然，佐久间象山在其他文稿里也尝言及彼得大帝，不详论。

^③ 世称“公车上书”系康有为发动；茅海建综合先行研究，以为不应视康有为是其事的带头发动者，参见茅海建《“公车上书”考证补》，收入氏著《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第1～99页。茅海建的论说，也受其他学人之批驳，不详论。

^④ 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1895年5月2日），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44页。

^⑤ 康有为的诸番上书，直至1898年1月29日的第6次上书始得为光绪帝览之，参见孔祥吉《乙未丁酉间康有为变法条陈考略》，收入氏著《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30～31页。

记》，借之“可考由弱至强之故”。^① 佐久间与康有为对彼得大帝的理解是否“正确”，^② 暂且不论；重要的是，这两位在具体的时空背景里堪称第一流的思想家，究竟是在什么样的知识凭借之上，开展他们因应世变而构思想象的观念旅程的？

以佐久间象山而论，他可能是从号称日本幕末时期“兰学者”的“大施主”渡边华山^③的《西洋事情书》那里，得到关于彼得大帝的知识的；^④ 康有为宣称由自己“译纂”的《俄彼得变政记》，其实是袭取删改自徐景罗翻译的《俄史辑译》^⑤，姑举数例对照（见表0-1）。

表0-1 康有为《俄彼得变政记》与徐景罗译《俄史辑译》内容对比

康有为《俄彼得变政记》	徐景罗译《俄史辑译》
……聘法人雷富卜德，讲文学、兵制。彼得闻之下泪曰：“外国政治、工艺皆胜我，何我国之不思仿效也？”于是有变政之心矣。……	……聘法国人雷富卜德训以文字、机。彼得下泪曰：“凡兹文武事宜，皆胜于俄，何我国之不早讲求也？”……
……下诏议游学。廷臣咸阻之。有谓国王宜端居国内，缓为化导，风俗自不变者；有谓用外国法，须考外国书，与本国恐难适用者；有谓以国王之尊而出外游学，甚为可耻者。彼得不听。……	……欲亲往慎视以图后举。廷臣咸谓王宜端居国内，缓为化导，风俗自能蒸蒸日上，何必亲劳宸蹕，远蹈险机。况用外国法，须考外国书，恐难适用。彼得又申解其意，以为非亲往不可。曰：“吾意决矣，卿等弗阻。”……

① 康有为：《为译纂〈俄彼得变政记〉成书可考由弱至强之故呈请代奏折》、《俄彼得变政记》（1898年3月12日），《康有为全集》第4册，第26~41页。

② 先行研究，如鲍绍霖即指陈，康有为对于彼得大帝的认识，颇不真确，参见鲍绍霖《帝术纵横：析论康有为“彼得大帝心法”之议》，《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3期，第111~123页。

③ 芳賀徹『渡辺寧山：優しい旅びと』朝日新聞社、1986、199頁。

④ 信夫清三郎『象山と松陰—開国と攘夷の論理』、100頁。

⑤ 本书征引版本为：徐景罗译《俄史辑译》（四卷），“丛书集成续编”第245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徐景罗，生平尚不详。冯承钧谓，《俄史辑译》是书四卷，为益智书会本，“景罗，宁波人，前有光绪十二年景罗序……是书似译自英文，译笔颇简洁，无游词费句，尤能力避用典，质而不俚，洵旧译本中之佳作也”。参见冯承钧《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西学与中外交通部分）》，邬国义编校《冯承钧学术著作集》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第1192页。

续表

康有为《俄彼得变政记》	徐景罗译《俄史辑译》
<p>……彼得先之瑞典，探其海口；之布，之荷兰，至含斯谈造船厂，更服为商船主衣饰，从船匠学艺，手制桅樯；又至晒带买船厂，更名求为厂伙，凡锯木、截铁、造缆、制帆皆习焉。……</p>	<p>……先至犁缚尼亚，其海口即犁噶，为瑞典属地，彼得甫至，遽为瑞之方伯斥逐，怒而矢誓曰后日必夺取此地。旋往布国，布厚待之，自布至荷兰都城含斯得谈，其地有造船厂……彼得假寓小室，复更服为商船主装饰，随在可行无阻，见船匠技艺甚高，乃购小艇一艘，手制桅樯。复至晒带买船厂，再易服从匠头学艺，凡锯木、截铁、造缆、制帆诸务悉全习焉。……</p>
<p>……彼得念国之富强由工艺之盛，大募法、荷、瑞诸国巧匠，面试其技，优者厚俸招往本国劝工。……于是仍在晒带习地理书。……</p>	<p>……遂募法、荷、瑞诸国巧匠，面试其技，优者以厚俸招往莫斯科作工。彼得仍在晒带买习地理书。……</p>
<p>……已闻英国甚巧，遂之英学造船，学造钟表，学勾股算学，学天文学；遇奇材异能之士，皆礼聘至俄，分遣济用。……</p>	<p>……彼得在晒带买时，厂匠惟教以作船之法，至是英匠乃教以修短巨细、优绌迟速之理，旋彼得即能自出心裁，造新式船一艘，行驶甚捷。又至造钟表所习艺。又聘哲士教以勾股算学。先时俄算法出于中国，只用算盘拨枚，彼得始通西法。闻苏格兰人法格胜善于天文，乃受业于门，请其往。俄立钦天监，俾占星日，彼得亦能预测蚀晕之期，不稍差谬。……</p>
<p>……令英匠疏遁河、窝瓦河，俾渐通海。于沿海作数港口，以利舟舶。筑船坞以便制造。于河之高下处，置坝闸以利往来。又新立税例，量出如入，以为常征；令富商主其事，无漏卮者，资用愈饶。立新议事会，国之大事，合诸臣公义，以多者为定，其权则自上操之。立大书院，厚其廪饩，使贵游子弟肄业其中。……</p>	<p>……令英匠疏遁河及窝瓦河，俾渐通海。又于沿海作数港口以通舟舶，筑船坞以便制造。凡于河之高下处始置坝闸以利往来。一千六百九十九年，新立税例，先是俄之粮税，凡勋贵巨家投纳从便，素无定例，至是量其所入，定为常征。令富商主其事，锱铢悉入，资用愈饶。是年立新议事会，俄之议事会颇有权势，诸事皆可酌定。彼得废之，损益其规，另立新会，俾权操于己。……彼得思有以慰悦之，乃立大书院三所，厚其廪饩，使教中子弟肄业其中。……</p>

资料来源：康有为《俄彼得变政记》，《康有为全集》第4册，第36~37页；徐景罗译《俄史辑译》第1卷，“丛书集成续编”第245册，第588~593页。其他部分，不详举例。